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东方杂志》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鲁法芹 著

当代
社会主义
研究文存

The Eastern Miscellany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Socialist
Thoughts in China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东方杂志》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鲁法芹 著

当代
社会主义
研究文存

The Eastern Miscellany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Socialist Thoughts in
China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方杂志》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鲁法芹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4. 7
(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文存)
ISBN 978-7-209-08800-8

I. ①东… II. ①鲁… III. ①期刊—研究—中国—民国 ②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史—中国—民国
IV. ①G239.296 ②D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1093 号

责任编辑: 隋小山

《东方杂志》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鲁法芹 著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装

规格 16 开(170mm × 240mm)

印 张 15.5

字 数 24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8800-8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电话: (0539) 2925888

前言

在中国，社会主义这一名词是一个舶来品，是西风东渐大背景下的一个外来词汇，是从工人运动高涨的西欧诸国以及东邻的日本传导给中国知识分子的。若从张德彝《随使法国记》中对1871年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情况的记述算起，已有一百四十余年；若从首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名字的《大同学》算起，也已一百一十年有余。在这近一个半世纪的光阴中，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九十余个华诞；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也已近六十年，尤其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十余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表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然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可谓气象万千，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此，这里姑且不论。问题恰恰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包含的一些基本理念，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没有讨论过？占多大分量？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以汲取？对如此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不仅关系着怎样认识中华民族已走过的历史道路，而且这种认识反过来又强烈地影响着对正在走的道路的历史主义理解。因之，要了解当今中国、了解当今中国的问题和走向，就要了解和把握近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发展脉络。

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帝制王朝从“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1〕}的夜郎自大的心理出发，采取闭关自守、实行海禁的政策。“天朝物产丰盈，无

〔1〕 萧令裕：《英吉利记》，载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25页。

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指英国——引者注）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许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1〕}，1793年乾隆皇帝给英王派遣的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臣的这一“敕谕”，实为清王朝闭关锁国的一道真实表白。但是，锁国难保国门，自大并非自强。“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战舰”^{〔2〕}，1832年化名胡夏米的英国间谍休·汉密尔顿·林赛（Lindsay Hugh Hamilton）等70余人乘坐“阿美士德”号对中国进行侦查后所得出的这一结论，成为英国政府侵华政策确立的关键一着，而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则给英帝国提供了大规模武装入侵的借口。伴随着第一、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社会进入了李鸿章所言的两个“数千年来未有”的局面：一方面，迫使中国告别了中世纪而被迫纳入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列，进入了以商品和资本来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轨道，“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另一方面，有着“十全武功”的“天朝”竟然屈膝于“尔么小夷”，列强“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3〕}。此后，在国贫民弱，外患日亟，亡国灭种一步步逼近的时刻，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向西方学习，以使国家独立富强，挣脱列强的枷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向西方学习，本是一个全面的复合过程，但其意蕴主要有两层：一，对内推封建主义之陈，行民主主义之新；二，对外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富强。也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走向近代化，面临着救亡和启蒙的双重重任。如何识别和处理二者的关系，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最大困境，而救亡压倒启蒙又是近代中国一个世纪有余的主旋律。事实是，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逐步展开的，经历了一个从表面到中层再到深层的演进过程，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三个发展阶段，即从“器物、制度到文化”这样的渐进过程。这是一个前后扬弃、彼此制约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过程：有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才能有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有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才有戊戌维新派的“西体西用”，再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体西化”，以及五四

〔1〕 转引自李达：《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30页。

〔2〕 南木：《鸦片战争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侦查活动》，载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11页。

〔3〕 〔清〕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选集》（上册），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印行，第97页。

运动以后的“全盘西化”，一环套一环，一个阶梯到另一阶梯，这一切都是历史本身所注定的，人们无法抗拒^{〔1〕}。换言之，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长技”到学习它的经济制度，进而认识和要求学习其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障它的发展，这种思维的逻辑发展正是历史发展过程的真实反映。正如马克思所言：“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但这不是一个顺顺当当的平稳过程，而是一个变革与反变革、前进与倒退相互交织的反复推进螺旋上升的过程。总的趋势是，资本主义一度曾成为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并出现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那样的革新和革命运动，引进和产生了若干资本主义成分，但作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建制却又是空中楼阁，徒具其形。

当历史进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先后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替代了商品输出。而甲午中日战争后的《马关条约》，一方面，为列强敞开了在中国兴建企业、修筑铁路以直接掌控中国经济命脉的所谓的“合法途径”；另一方面，列强又掀起了在中国夺取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浪潮，民族危机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在外国资本的直接刺激下，加以清政府严重的财政危机而无力再大规模投资创办新式企业，不得不改变经济政策，开始放松对民间投资办厂的限制，逐步重视和鼓励发展商办企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由此开始步入了它真正的初步发迹时期^{〔3〕}。此时，在反思顽固派和洋务派思想和政策何以失败的同时，资产阶级改良派即维新派登上了历史前台。然而，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很快就被顽固派镇压下去。之后的义和团运动特别是八国联军入侵后，帝国主义利用《辛丑条约》加紧侵略，清政府完全投靠帝国主义的面目更加暴露。据统计，甲午战争以后至20世纪最初10年间，新设民用工矿企业总数797家，资本总额17090.4万元，其中商办企业649家，资本额为12242.9万元，占资本总额的71.6%^{〔4〕}。仅20世纪头十年间，就新设工

〔1〕 郑彭年：《西风东渐——中国改革开放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9页。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3〕 据统计，从1872年到1894年20余年所开设的工厂只有74家，其中商办54家；而从1895年到1900年5年内设立的工厂就有82家，其中商办68家。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93页。

〔4〕 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厂326家,其中商办265家^[1],占总数的81.29%。可见,此时的商办企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资本投资额上,都大大超过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企业,因此,这时的问题“已不是要不要保护、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问题,而是如何保护、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问题”^[2]。从这个意义上讲,再加以改良派从理论上由“君主立宪”退化为“开明专制”,也就注定了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必定会让位给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此,革命成了中国人的主导话语。

但是,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人士,在流亡国外期间,尤其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新思想运动中心,移至日本东京”^[3]时,却遇到了另一番场景,那就是他们看到了垄断资本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深重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积弊,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目睹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进而认可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合理性。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云:社会主义“乃为后此第一大论题也”^[4]。1902年发表的《干涉与放任》一文中,梁启超认为资本主义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也明矣”;次年又发出“吾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叹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的感叹^[5]。孙中山更是认为并多次强调“社会革命”在欧美是不能避免的,并以此论证他的民生主义的正当性。一些旅欧先进知识分子更是介绍和鼓吹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为“将来社会革命之先导”^[6]。总之,此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流派可划分为三派:立宪派的社会主义、革命派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派的社会主义。与其说前两派主张的是社会主义,毋宁说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政策^[7];后者的主张与“世界大同”、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更有紧密联系,比前两派的共和国主张更令人心动,反映了小生产者要求社会均平的要求。但是,正如学者们所言,在那时,中国还缺乏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条件,也缺乏思想的准备,因此,社会主义没有也

[1]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93页。

[2]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3页。

[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4] 康有为:《大同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4—275页。

[5]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钟叔河主编:《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新大陆游记及其他/癸卯旅行记/归潜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63页。

[6] 《新世纪之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976页。

[7] 把国家经营实业的思想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很能切合中国文化传统。比如,钱穆就把汉武帝时期所实行的盐铁政策比附于国家社会主义政策。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页。

不可能在中国传播，而只能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被曲解和误解，进而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在群众中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而且很快就烟消云散了^{〔1〕}。不过，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意义上看，他们的宣传也为稍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预埋了伏笔和作了思想、知识储备。这个功绩也是不能被简单地抹杀的。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刊的《新青年》杂志，在尊孔、复辟的喧嚣声中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它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向着传统进行了猛烈地攻击。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功过是非，学界自来争论颇多，这里不作详细探究。但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这一视角看，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提出的“多数国民之运动”问题，值得关注。文中称：“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2〕}。稍后，他又“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3〕}。这就点明了以往的洋务、变法、革命只是运动群众去实现鼓吹者的目标，而民众并没有得到多少民主权利。正是从“伦理的觉悟”这种“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认识出发，陈独秀号召要“以个人本位主义”来“易家族本位主义”^{〔4〕}。正是在《新青年》的号召和五四运动的冲击下，年轻一代的热血青年们走出了家门。这种在当时看来是“离经叛道”的个人伦理行为，往往又和政治诉求尤其是追求理想社会的愿望相互掺杂在一起^{〔5〕}。这些向往一种真正完美的理想社会的青年知识分子，很快组成了各种团体来组织和追求真理以及实践某种社会理想：既要超越当时中国的黑暗现实，又要超越先进却又弊病丛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正是当时那些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的现实社会心理背景。对此，学者丁守和描绘道：对于一切旧文化来说，新文化是指社会主义思想。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思潮是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但就是在这一主流中最初也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除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以及合作主

〔1〕 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60页。

〔2〕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3〕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4〕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5〕 1919年11月，毛泽东在长沙发动的思想运动，就与新娘赵五贞花轿中自杀有关系。李锐：《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9—371页。

义，而无政府主义中还有什么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蜂拥而来^{〔1〕}。李维汉的回忆亦可作为旁证。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他称社会主义“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2〕}。这种“奋斗目标”的最初实践，就是1919年3月“北京工读互助团”的诞生，但仅仅两个多月工读互助团第一小组就宣布解散。不唯此，周作人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介绍日本“新村”的实验、毛泽东也有在湖南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恽代英也为“共同生活”拟定了14条计划^{〔3〕}……可见，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泛劳动主义等“中国式……主义”^{〔4〕}影响之广泛，并试图以工读互助团、新村等实验来获得改造社会的模型^{〔5〕}。对此，施存统有言：“凡是理想社会所当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试验的都试验起来，做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型，得一个改造社会的方针”；实验失败后，他得出了两大教训：“（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6〕}。小团体的和平实验一次次地失败了，而此时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大社会改造却获得了成功，两相对照之下，“这似乎证明着马克思列宁胜过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更不用说胜过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陈旧思想了”^{〔7〕}。从此，马克思学派的社会主义以雷霆万钧之势激荡着中国的思想界。它暗合了中国社会要“根本改造”的理论诉求，并且提供了建立理想社会途径的理论支撑。之后，中国思想界的每次争论都深深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讨论、科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文艺民族形式论战、工化与农化之争，如此等等。社会主义这一“普照

〔1〕 丁守和：《陈独秀和〈新青年〉》，《中国现代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79页。

〔2〕 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载《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

〔3〕 恽代英：《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119页。

〔4〕 王光祈说：“这种主张如果没有适当的名称，就叫他中国式……主义”。参见《王光祈致君左》，《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1卷第4期，1919年6月1日。

〔5〕 主要内容有：一是以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新世界为根本目标；二是以工读结合作为改造社会、达到理想境界的手段；三是以互助精神为基本生活原则和基本道德原则；四是建立团体，改造社会。陈旭麓：《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180页。

〔6〕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转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9、523页。

〔7〕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2—23页。

的光”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行程……本著述试图通过发掘和梳理《东方杂志》上有关涉及社会主义的文献，来刻画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图景。

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904年3月11日，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的综合性大型期刊——《东方杂志》在上海创刊，初定名《东亚杂志》，因与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所办刊物译名相同，正式发刊时改为现名。开始为月刊，为文摘类性质的刊物，每年12号为一卷，以“杂”著称，即杂集各家报刊之时事新闻、各类消息，辟有社说、谕旨、内务、军事、外交、教育、财政、实业、交通、商务、宗教、杂俎、小说、丛谈以及新书介绍等15个栏目，介绍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诸方面的最新信息，以便“内地人士，无力遗阅各报者，得此亦足周知中外近事”〔1〕。自第17卷起，经杜亚泉之手，该刊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大的变革，版本改为16开，半月刊，每期字数从10万增加到20万，改变了过去文摘类刊物的性质。内容上，各种思潮兼收并蓄，“凡世界最新政治经济社会变象，学术思想潮流，无不在‘东方’译述介绍”〔2〕，同时增辟了“科学杂俎”栏目以普及科学知识，增设“谈屑”栏目以针砭时弊，等等。仅以杜亚泉为例，就以“伧父”、“高劳”等笔名介绍了摩尔、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翻译并连载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之后的钱智修和胡愈之也对该刊进行了大的改革：采用白话文，一扫以往晦涩之面貌，紧跟时代之步伐；尤其是在胡愈之任主编时期，《东方杂志》栏目又增设了时事评论、世界新潮、文苑等，使原来仅对国际时事政治的简单介绍变成了对国际问题的评述和研究；减少介绍科技发展版面增加对社会科学新思想的介绍，同时大大增刊对中国哲学、文学、经济、政治等的研究性论文，使之真正成为一个社会科学的综合性杂志。1947年8月，自第43卷第14号又开始改为月刊，1948年12月在大陆终刊。徐珂、孟森、杜亚泉、陶惺存、钱智修、胡愈之、李圣五、郑允恭、苏继顾等先后任主编。《东方杂志》自创刊起至在大陆终刊，历时45年，共出44卷，819期/号，813册，含3种增刊，30种专号、纪念号，21种专辑、特辑。其间经辛亥革命、一·二八事件、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四度休刊。1967年7月，王云五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复刊《东方杂志》，出版了若干

〔1〕《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东方杂志》1904年第1卷第1号。

〔2〕胡愈之：《追悼杜亚泉先生》，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编：《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辑》（第1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页。

年，但复刊后的《东方杂志》，其学术资料价值，与颇负盛誉的“旧东方”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一是复印的“旧东方”存在诸如“删改若干重要文章”、“篡改文章标题”、“擅变作者姓名”等一些问题；二是“复刊后所发文章，却一改曾为海内外学人所肯定的办刊主旨，全无学术意向，多为粉饰、赞美台湾当局和歪曲、攻击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之作，与该刊复刊时所宣布的编辑方针大相径庭。”^{〔1〕}本书以《东方杂志》在大陆的发行文本为依据，不包含王云五在台湾复刊的《东方杂志》文本。

《东方杂志》历经清末、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重大历史时期，为旧中国“杂志中时期最长久而最努力者”^{〔2〕}。《东方杂志》紧跟时代脉搏，忠实记录了我国近现代发展的历史轨迹，成为近现代史的见证，被美誉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库”、“杂志界的重镇”、“杂志的杂志”。因此，它在近现代中国期刊出版界和思想文化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著名翻译家林纾、傅东华，哲学家张君勱、梁漱溟，教育家蔡元培，著名作家茅盾、周作人、徐志摩、周建人、张资平、巴金，学者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历史学家陈衡哲、周谷城、岑仲勉，经济学家马寅初，社会学家孙本文，科学家竺可桢，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恽代英、瞿秋白，著名新闻活动家黄远生、邵飘萍、马星野，^{〔3〕}……这串名单基本上包罗了当时中国各个文化领域内的精英人物、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各个学术领域的佼佼者无不在它上面留下了声音，中国思想界的每一次波动无不在它上面存有痕迹。”^{〔4〕}唯此之故，台湾和大陆先后把《东方杂志》全套复印出版，成为研究近现代史的学者们很有用的参考书和绕不过的门槛。

探求中国社会发展和民族自身解放之路，是围绕在《东方杂志》周围的知识分子的出发点和内驱力。他们政治上爱国，反对专制制度，不完全赞同暴力革命，多主张阶级调和，希望通过和平渐进的改良之路以达国家独立富强之目的。在编辑方针上，兼容并包，既鼓吹唯心论，也刊登唯物论；既介绍科学知识，也传播“灵魂学”；……只“希望为舆论的顾问者，而不敢自居为舆论的指导

〔1〕 吴斯清：《〈东方杂志〉及其台湾版》，《贵州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2〕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

〔3〕 石雅洁：《〈东方杂志〉办刊特色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第11—12页。

〔4〕 洪九来：《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者”^[1]。在对待文化思想的态度上，主张新旧折中、中西调和、议论多元，既阐释自己的主张，也发表对方不同政见；既不赞成暴力革命，又发表批判改良主义经济思想的文章；……“不敢揭一派之旗帜以自限域。有时且故列两派相反之学说以资比较”^[2]。在关系世界走向和人类前途命运的两大主义之间，既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端和实质，又深刻指出从经济制度的变迁上看，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过程，而“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生产于资本主义的胎里，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矛盾”^[3]，认为中国无法避开资本主义道路；既认为欲预防资本主义之发生，只有主张社会化之生产，将生产工具归于社会所有，又指出产业所有权，为人类进化之要素、社会隆盛之原则、进化之机括、社会幸福之根本也；……之所以会如此，就在于《东方杂志》编辑人员认为，“与其以感情的言论，刺激读者之神经，毋宁以有用的知识，开拓读者之心胸；与其发表未成熟的主张，使读者跟着走错路，毋宁提供事实的真相，给读者做自下主张的底子。”^[4]抛开政治倾向性不谈^[5]，《东方杂志》“不仅历史悠久，且其内容始终保持超然独立之立场，为文化人之主要发言园地，故能风行社会，成为杂志界之重镇，四十余年来，‘东方’对于学术文化之倡导与传播，民间舆论之反映与建议，乃至国际外交局势之分析皆曾扮演重要角色，其对国家民族之贡献”尤甚：诸如专业精神、新闻自由的争取、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永久站在知识领域的前线以及重视国际局势的发展等^[6]。换言之，《东方杂志》所展现的是一种潜在的、道德权威的和限于思想影响与言论影响的力量，而非一种政治的权力和行动的力量^[7]。

《〈东方杂志〉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这一名称表明，笔者所着力探讨的，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一“老话题”。对此，无论是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国革命史研究抑或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中，都已取得了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本书拟从《东方杂志》历任主编和作者

[1][4] 坚瓠：《本志的第二十年》，《东方杂志》1923年第20卷第1号。

[2] 坚瓠：《本志之希望》，《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1号。

[3] 张维桢：《班纳克支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观》之“记者”按语，《东方杂志》1929年第26卷第14号。

[5] 有学者把《东方杂志》的政治倾向性概括为两点：一，该刊物表现出反对法西斯侵略、反对对日妥协退让的鲜明的抗日爱国立场；二，对国内政治问题的焦点——即国共两党的矛盾，持回避态度，虽然批评国民党的一些基本国策，但又不直接否定其统治地位，因此在国内政治问题上的倾向是保守的。爱国与保守这两点在这份刊物上融为一体而表现出来。其原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二重性的反映、刊物传统思想的影响和延续以及编辑人员政治倾向的反映。李斯颐：《30年代〈东方杂志〉政治倾向的成因》，《新闻与传播研究》1990年第3期。

[6] 黄良吉：《东方杂志之刊行及其影响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44—156页。

[7] 闵定庆：《公共舆论与现代性的展开》，《中国出版》2007年第3期。

群体这批“松散的自由主义者”^{〔1〕}的视角来“旧话重提”。创刊于1904年终刊于1948年的《东方杂志》，首先，从时间段上看，恰好经历课题所选择的时间段，这为研究提供了非常翔实的一手资料。其次，当传统社会主义的某些观念，譬如计划经济、单一公有制等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时，才开始具有了相对完整的研究对象和独立的学术研究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才刚刚出现在理论研究的前台而成为显学。而围绕在《东方杂志》周围的知识分子一直保持着自己独特的立场和思想文化品格，对社会主义有着自己的解读，因此，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变迁史，《东方杂志》是绕不开的。复次，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史之所以吸引我，使我不得不下大力气和笨工夫去研究，实在是因为它——在笔者看来——并不是已经过去或完成了的东西，而正是我们今天应该批判继承的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因为思想的发展和超越是以反思、批判和借鉴前人思想为前提条件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时至今日，《东方杂志》上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和系统的发掘，这与其当时显赫的社会影响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憾事。

从理论来源上看，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其中，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都为其提供了思想来源；大而言之，列宁实践的新经济政策，也可以看做是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原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方杂志》上有关对列宁新经济政策、孙中山民生主义的解读，对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巨大的借鉴意义。比如，《东方杂志》上所提到的新经济政策“大半皆手段也，非目的也”的观点、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的逻辑是“发展国家资本扩大国营事业”的观点、“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见解以及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泾渭分明互相对峙的年代所提出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存立于同一世界上，非必不可能”的预见，如此等等，在今天看来，就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所以，通过对《东方杂志》曾发表过的有关社会主义和左翼文献的发掘，探索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对社会主义实践（主要指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反思，就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1〕 洪九来：《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目 录

前言 / 1

上篇 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与流派

第一章 《东方杂志》对马克思学派社会主义学说的把握与理解 / 3

第一节 关于马克思与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 / 3

第二节 关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 / 6

一、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意义 / 6

二、对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 / 13

第三节 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 24

一、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阐释 / 25

二、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质疑 / 31

第四节 对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认知 / 35

一、资本集中说“不合乎事实” / 36

二、产业所有权者“社会幸福之根本也” / 40

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没落期的资本主义的攻势的一种形相”
/ 42

第二章 《东方杂志》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理论介评 / 50

第一节 关于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的源起 / 51

一、对“基尔特”的阐释 / 51

二、19世纪80年代是“英国社会主义中兴的时代” / 53

三、基尔特社会主义是由莫里斯“艺术观劳动观生出之社会主义思想”
/ 57

第二节 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原理的讨论 / 61

一、基尔特社会主义“能综合一切非马克思派之所长” / 62

二、自治理论 / 64

三、职能原理 / 68

第三节 对“社会主义论战”的评说 / 72

一、张东荪对社会主义的解析 / 72

二、张东荪“另一个地方”所指 / 77

三、《东方杂志》对“论战”的见解 / 82

第三章 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阐释 / 90

第一节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 91

一、无政府主义与虚无主义 / 91

二、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译介 / 96

第二节 对社会主义的界说 / 101

一、无政府主义者言社会主义 / 101

二、师复对民生主义的诘难 / 107

三、对诘难的评析 / 110

第三节 《东方杂志》对无政府主义的介评 / 112

一、社会主义“非无政府主义” / 113

二、对无政府主义的阐释 / 115

下篇 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

第四章 《东方杂志》对孙中山民生主义学说及国民政府贯彻民生主义实践的 评说 / 125

第一节 关于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 / 126

- 一、民生主义“采社会主义之精义” / 127
- 二、民生主义“非清一色社会党的社会主义也” / 130

第二节 对平均地权理论的解读 / 134

- 一、对阎锡山“土地村公有”主张的评价 / 135
- 二、对平均地权的诠释 / 138
- 三、土地村公有乎实行增值税乎 / 146

第三节 对节制资本方案的解读 / 148

- 一、关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经营范围的讨论 / 148
- 二、资本方案的逻辑：“发展国家资本扩大国营事业” / 152
- 三、对国有国营事业的评价 / 155

第五章 《东方杂志》对十月革命的介绍和研究 / 160

第一节 十月革命“一切措施均含有社会主义之色彩” / 160

- 一、对十月革命历史进程的解读 / 161
- 二、对十月革命性质和意义的把握 / 165

第二节 战时共产主义“破坏及第而建设落第”么 / 168

- 一、十月革命以“政治革命底方法”实行“经济革命底目的” / 168
- 二、对战时共产主义的评价 / 170

第三节 新经济政策“大半皆手段也非目的也” / 173

- 一、对新经济政策实施原因的解说 / 173
- 二、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及其实质 / 176
- 三、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的影响 / 182

第六章 《东方杂志》对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讨论 / 187

第一节 对“产业合理化”和“统制经济”的研究 / 188

- 一、关于产业合理化的历史、理论与后果 / 189
- 二、对“统制经济”的评说 / 192

第二节 《东方杂志》对计划经济的介析 / 198

- 一、某一学说之兴废“每与时势为仆缘” / 198
- 二、苏俄“五年计划”的最大目的是“力求其主义的贯彻” / 201

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生存形态” / 204

第三节 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 / 208

一、对计划经济的质疑 / 208

二、关于“计划的自由主义” / 215

结束语 / 225

后记 / 232